



故人 故事 故情

王保生 编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青年阅读文库

散文卷

青年阅读文库

散文卷

故人 故事 故情

王保生 编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陕)新登字 004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故人故事故情/王保生编,一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4

(青年阅读文库·散文卷)

ISBN 7-5419-7541-9

I . 故… II . 王… III .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现代②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 I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11348 号

西安百花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 毫米 1/32 开本 8.375 印张 4 插页 184 千字

1999 年 4 月第 1 版 199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定 价:10.20 元

读者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厂联系调换

厂址:西安长安南路长延堡工业区 邮编:710061 电话:5256640

前　　言

王保生

人的生老病死，与草木荣枯一样，这是自然规律，谁也无法抗拒。生生死死，连续不断，这才自然界，也才有人类社会。没有生，也就没有死，没有死，也就无所谓生。生死这对矛盾，从来是互相纠缠，谁也离不开谁的。在一般情况下，人们有对生的欢愉和对死的哀切。只有在特殊情况下，一些人为了崇高的事业，才表现出“视死如归”、“慷慨赴义”，这与常人的喜生畏死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理智上明白有生就有死，但生离死别，毕竟是人生的一大悲苦，亲人、朋友的诀别，更为悲苦的极至，因而历代悼亡之作，除了一些对权贵的谀墓之作外，文学史上还是留下了一些有着至情至性的篇章，如苏轼的《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韩愈的《祭十二郎文》和欧阳修的《祭石曼卿文》，都是脍炙人口的作品。在文艺的百花园里，悼念文也有它的一席之地。

毛泽东同志在《为人民服务》这篇著名文章中说，一个人死了，开个追悼会，一是“寄托我们的哀思”，二是要“使整个人民团结起来”。写悼念文章的目的，其实也是这样两条，一是主观上的一种宣泄，把郁积在胸的悲哀化作文字，痛痛快快地发挥一下，心头为此可以稍稍舒解；二是通过对逝者精神、业绩的追叙、褒

扬，使生者振奋起来，把逝者的精神发扬光大。

收集在这里的二十八篇作品，写于本世纪 30 年代到 90 年代，跨越了两个时代。在旧中国的黑暗世界里，瞿秋白、柔石、殷夫、胡也频等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为了共产主义事业，抛头颅、洒热血，付出了生命的代价。鲁迅在《为了忘却的记念》中两次悲痛地写道：“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国失掉了很好的青年”，在那“夜正长，路也正长”的年代里，他抑止住自己的悲愤，寄希望于将来。但是人们无论如何不会想到，斗转星移，革命成功了，新中国成立了，前进的道路竟还是那么艰难。一场文化大革命，竟使上至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下至平民百姓遭受那么惨酷的劫难，一条极“左”路线，制造了那么多冤假错案。叶圣陶老人说，十年“人祸”，仅他相识的朋友致死的就有一百左右。知识分子、文化人在这场浩劫中首当其冲，金仲华、傅雷、丽尼、侯金镜、陈序经、萧珊倒下了，许多富有才华、学识的人倒下了，文化大革命成了革文化人命的运动。长歌当哭，当我们今天哀悼这些冤魂、英魂时，心中只有企望，让我们永远埋葬制造悲剧的那条路线。

挽悼性散文，是用血与泪浇灌起来的作品，与一般散文相比，它的感情更为强劲、浓烈，作者把深沉的感情融于真切的记叙之中。正如《古文观止》评注韩愈的《祭十二郎文》所说：“情之至者，自然流为至文。读此等文，须想其一面哭，一面写，字字是血，字字是泪。未尝有意为文，而文无不工。”这类散文往往有两个主角，一是死者，一是作者，是作者与死者的对话。它既要写出逝者感人的事迹和业绩，又要写出生者的哀痛和思念，这里没有任何虚假、矫饰的地位，关键是要写出真情至性。它必须裸露作者的个性，展示自己的心灵，它是作者人格的显示。这里有朱自

清、巴金、孙犁写的三篇悼念亡妻的文章，可以说一篇有一篇的才情，一篇有一篇的风格。朱自清的《给亡妇》，用的是第二人称，是一种拉家常式的絮语，如泣如诉，如丝如缕，委婉细腻，亲切动人。全文的句式是你怎样怎样，我又如何如何，读来令人柔肠百结，悲从中来；巴金的散文从来比较展开，因而他的《怀念萧珊》比较从容地叙述了爱妻人生道路的最后几年，选择了动乱年月的一些生活细节，为读者勾勒出了一位温柔善良、正直无私的贤妻的形象。萧珊的去世带给巴金的悲痛是那么巨大，那种刻骨铭心的爱，肝肠寸断的悲，便潮涨浪涌，翻腾于胸。巴金的散文，爱和恨总是那么鲜明。他的抒情方式，总是那么迴环往复，层层递进。孙犁的《亡人逸事》，只择取了几个刻骨铭心的片断，使亡妻的音容笑貌、脾气秉性跃然纸上。它很有苏轼那首悼念亡妻的《江城子》的韵味：“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作品纯用白描手法，用淡笔来写深情，因而使此文像陈年的村醪，醇厚悠远。

挽悼性散文的形式也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彩多姿的，有的以叙述为主，有的偏重抒情，有的夹叙夹议。周作人的《志摩纪念》、叶圣陶的《追念金仲华兄》、郑振铎的《哭佩弦》，笔力凝重，很少见有大段的内心抒发，它择取逝者生前几件事，叙述中加以评议，使思念哀痛之情像涓涓细流，在文句中自然流淌；曹靖华的《罗汉岭前吊秋白》，结构上可分为前后两部分，前面部分记叙作者 1951 年赴江西长汀寻访秋白牺牲地的经过，后面部分，笔调一转，变成直接对秋白的回忆。每段的开头，不是“秋白”，就是“你”怎样怎样，语句和语气，完全变成了对朋友的倾诉衷肠。逯斐的《让我送送您》，作者一边伴送丁玲的灵车向八宝山进发，一边也在默默地回忆半个世纪相识的长河中，丁玲留给自己的一

朵朵美好的浪花，一颗颗晶莹的水珠。全文一气呵成，敬重、感激之情，贯注在每一个字句里。宗璞的《哭小弟》，把情与理、现实和回忆、家庭和社会进行了交错组接。譬如对小弟逝世时大家悲苦的情状，以及对小弟认真勤奋的一生的追述，作者不是采用单线式的叙述，而是分成块状错落架叠，谨严有致，不枝不蔓，整篇文章取得了立体的效果。陶斯亮的《一封终于发出的信》，用给被迫害致死的父亲陶铸写信的方式，直抒胸臆，倾吐郁积在胸多年的思想、挚爱和愤懑之情，同时也突现了陶铸同志“心底无私天地宽”的高尚精神品貌。章含之的《谁说草木不通情》，成功地借助老梨树和柿子树的兴衰变迁作为自己感情的寄托，草木成了被作者“情化”的有情之物，真挚缠绵，哀婉动人，既显现了外交家乔冠华富有人情、风采照人的形象，又表现了他们伉俪情笃、相依为命的身影。

在众多的悼念鲁迅先生的文章中，萧红的《回忆鲁迅先生》是最有特色的。她把悼念文章惯用的字句统统去掉，只是娓娓道来，没有呼天抢地的哀悼，也没有慷慨激昂的誓言，似乎只是随意地写下鲁迅先生日常生活中一件件、一桩桩往事，犹如自然隐现的一个个电影镜头。文章的结尾是：“十九日，工作完了，他休息了。”在那看似平静的河水下流淌着感情的激流，它把无穷的思念、崇高的敬意，都浓缩在短短的字句里了。

时光是超乎物外的，它根本不管人世间的悲欢离合，从无始至无终，始终是狂奔不息的。鲁迅为“左联五烈士”，为范爱农、韦素园等写悼念文章，萧红又为鲁迅写悼念文章，不想几年之后，萧红又英年早逝，又有不少人为萧红写悼念文章。就这个集子的二十八篇文章而言，作者已有十多个已经作古，分别又有许多悼念文章出现。季羡林文章中说，一个常常写悼念文章的人，距离

别人为自己写悼念文章，为期不远矣。诚哉斯言。人世间就是这样生生死死，死死生生，欢欢悲悲，悲悲欢欢，代无穷尽。每一个人都会有青春不能长驻，生命不能长存的万古长恨。但死者长已矣，生者不能常戚戚，季先生引用陶渊明的诗“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表现了一个明白生死之理的人的坦荡襟怀。他要在也许有限的有生之年中，与时间赛跑，更加努力地工作，为无限的人类解放事业贡献自己的一切力量。这是写悼念文章的宗旨，也是写作者人格的显现。

目 录

前 言	[1]
为了忘却的纪念	鲁 迅[1]
忆韦素园君	鲁 迅[11]
记耀春之殇	郁达夫[17]
志摩纪念	周作人[22]
给亡妇	朱自清[26]
追念金仲华兄	叶圣陶[31]
哭佩弦	郑振铎[34]
罗汉岭前吊秋白	曹靖华[39]
悼组缃	季羨林[51]
回忆鲁迅先生	萧 红[57]
怀念萧珊	巴 金[93]
忆金镜	陈白尘[107]
抬头看手迹,低头思故人	臧克家[115]
怀傅雷	柯 灵[127]
母亲	徐懋庸[135]
告慰丽尼	荒 煤[142]

- 亡人逸事 韩 犀[147]
风范难忘 曾敏之[152]
追怀雪峰 唐 碧[158]
让我送送您 遂 双[175]
写给无名碑 唐 瑜[182]
蜡炬成灰 韦君宜[187]
哭芦芒 嵘 青[192]
哭小弟 宋 璞[201]
哭俞老师 施淑青[207]
一封终于发出的信 陶斯亮[216]
谁说草木不通情 章含之[235]
祭幺婶文 周同宾[251]

鲁 迅(1881—1936) 浙江绍兴人。1898年离家到南京读书,1902年赴日本留学,1909年回国任教,1912年到北京,任教育部教育司科长、佥事。其后在多所高等学校讲课,1926年赴厦门大学任教,1927年1月转赴广州中山大学,任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同年10月离开广州到上海。主要作品有小说集《呐喊》、《彷徨》、《故事新编》,散文集《野草》、《朝花夕拾》,杂文集《热风》、《华盖集》、《坟》、《而已集》、《二心集》、《三闲集》、《且介亭杂文》等。

为了忘却的记念

鲁 迅

—

我早已想写一点文字,来记念几个青年的作家。这并非为了别的,只因为两年以来,悲愤总时时来袭击我的心,至今没有停止,我很想借此算是竦身一摇,将悲哀摆脱,给自己轻松一下,照

直说，就是我倒要将他们忘却了。

两年前的此时，即一九三一年的二月七日夜或八日晨，是我们的五个青年作家同时遇害的时候。当时上海的报章都不敢载这件事，或者也许是不愿，或不屑载这种事，只在《文艺新闻》上有一点隐约其辞的文章。那第十一期（五月二十五日）里，有一篇林莽先生作的《白莽印象记》，中间说：

他做了好些诗，又译过匈牙利诗人彼得斐的几首诗，当时的《奔流》的编辑者鲁迅接到了他的投稿，便来信要和他会面，但他却是不愿见名人的人，结果是鲁迅自己跑来找他，竭力鼓励他作文学的工作，但他终于不能坐在亭子间里写，又去跑他的路了。不久，他又一次的被了捕。……

这里所说的我们的事情其实是不确的。白莽并没有这么高慢，他曾经到过我的寓所来，但也不是因为我要求和他会面；我也没有这么高慢，对于一位素不相识的投稿者，会轻率的写信去叫他。我们相见的原因很平常，那时他所投的是从德文译出的彼得斐传，我就发信去讨原文，原文是载在诗集前面的，邮寄不便，他就亲自送来了。看去是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面貌很端正，颜色是黑黑的，当时的谈话我已经忘却，只记得他自说姓徐，象山人；我问他为什么代你收信的女士是这么一个怪名字（怎么怪法，现在也忘却了），他说她就喜欢起得这么怪，罗曼谛克，自己也有些和她不大对劲了。就只剩了这一点。

夜里，我将译文和原文粗粗的对了一遍，知道除几处误译之外，还有一个故意的曲译，他像是不喜欢“国民诗人”这个字的，都改成“民众诗人”了。第二天又接到他一封来信，说很悔和我相

见，他的话多，我的话少，又冷，好像受了一种威压似的。我便写一封回信去解释，说初次相会，说话不多，也是人之常情，并且告诉他不应该由自己的爱憎，将原文改变。因为他的原书留在我这里了，就将我所藏的两本集子送给他，问他可能再译几首诗，以供读者的参看。他果然译了几首，自己拿来了，我们就谈得比第一回多一些。这传和诗，后来就都登在《奔流》第二卷第五本，即最末的一本里。

我们第三次相见，我记得是在一个热天，有人打门了，我去开门时，来的是白莽，却穿着一件厚棉袍，汗流满面，彼此都不禁失笑。这时他才告诉我他是一个革命者，刚由被捕而释出，衣服和书籍全被没收了，连我送他的那两本；身上的袍子是从朋友那里借来的，没有夹衫，而必须穿长衣，所以只好这么出汗。我想，这大约就是林莽先生说的“又一次的被了捕”的那一次了。

我很欣幸他的得释，就赶紧付给稿费，使他可以买一件夹衫，但一面又很为我的那两本书痛惜：落在捕房的手里，真是明珠投暗了。那两本书，原是极平常的，一本散文，一本诗集，据德文译者说，这是他搜集起来的，虽在匈牙利本国，也还没有这么完全的本子，然而印在《莱克朗氏万有文库》(Reclam's Universal Bibliothek)中，倘在德国，就随处可得，也值不到一元钱。不过在我是一种宝贝，因为这是三十年前，正当我热爱彼得斐的时候，特地托丸善书店从德国去买来的，那时还恐怕因为书极便宜，店员不肯经手，开口时非常惴惴。后来大抵带在身边，只是情随事迁，已没有翻译的意思了，这回便决计送给这也如我的那时一样，热爱彼得斐的诗的青年，算是给它寻得了一个好着落。所以还郑重其事，托柔石亲自送去的。谁料竟会落在“三道头”之类的手里的呢，这岂不冤枉！

二

我的决不邀投稿者相见，其实也并不完全因为谦虚，其中含着省事的分子也不少。由于历来的经验，我知道青年们，尤其是文学青年们，十之九是感觉很敏，自尊心也很旺盛的，一不小心，极容易得到误解，所以倒是故意回避的时候多。见面上尚且怕，更不必说敢有托付了。但那时我在上海，也有一个惟一的不但敢于随便谈笑，而且还敢于托他办点私事的人，那就是送书去给白莽的柔石。

我和柔石最初的相见，不知道是何时，在那里。他仿佛说过，曾在北京听过我的讲义，那么，当在八九年之前了。我也忘记了在上海怎么来往起来，总之，他那时住在景云里，离我的寓所不过四五家门面，不知怎么一来，就来往起来了。大约最初的一回他就告诉我是姓赵，名平复。但他又曾谈起他家乡的豪绅的气焰之盛，说是有一绅士，以为他的名字好，要给儿子用，叫他不要用这名字了。所以我疑心他的原名是“平福”，平稳而有福，才正中乡绅的意，对于“复”字却未必有这么热心。他的家乡，是台州的宁海，这只要一看他那台州式的硬气就知道，而且颇有点迂，有时会令我忽而想到方孝孺，觉得好像也有些这模样的。

他躲在寓里弄文学，也创作，也翻译，我们往来了许多日，说得投合起来了，于是另外约定了几个同意的青年，设立朝华社。目的是在绍介东欧和北欧的文学，输入外国的版画，因为我们大家都以为应该来扶植一点刚健质朴的文艺。接着就印《朝花旬刊》，印《近代世界短篇小说集》，印《艺苑朝华》，算都在循着这条线，只有其中的一本《蕗谷虹儿画选》，是为了扫荡上海滩上的“艺术

家”，即戳穿叶灵凤这纸老虎而印的。

然而柔石自己没有钱，他借了二百多块钱来做印本。除买纸之外，大部分的稿子和杂务都是归他做，如跑印刷局，制图，校字之类。可是往往不如意，说起来皱着眉头。看他旧作品，都很有悲观的气息，但实际上并不然，他相信人们是好的。我有时谈到人会怎样的骗人，怎样的卖友，怎样的吮血，他就前额亮晶晶的，惊疑地圆睁了近视的眼睛，抗议道，“会这样的么？——不至于此罢？……”

不过朝花社不久就倒闭了，我也不想说清其中的原因，总之是柔石的理想的头，先碰了一个大钉子，力气固然白化，此外还得去借一百块钱来付纸账。后来他对于我那“人心惟危”说的怀疑减少了，有时也叹息道，“真会这样的么？……”但是，他仍然相信人们是好的。

他于是一面将自己所应得的朝花社的残书送到明日书店和光华书局去，希望还能够收回几文钱，一面就拼命的译书，准备还借款，这就是卖给商务印书馆的《丹麦短篇小说集》和戈理基作的长篇小说《阿尔泰莫诺夫之事业》。但我想，这些译稿，也许去年已被兵火烧掉了。

他的迂渐渐的改变起来，终于也敢和女性的同乡或朋友一同去走路了，但那距离，却至少总有三四尺的。这方法很不好，有时我在路上遇见他，只要在三四尺前后或左右有一个年青漂亮的女人，我便会疑心就是他的朋友。但他和我一同走路的时候，可就走得近了，简直是扶住我，因为怕我被汽车或电车撞死；我这面也为他近视而又要照顾别人担心，大家都仓皇失措的愁一路，所以倘不是万不得已，我是不大和他一同出去的，我实在看得他吃力，因而自己也吃力。

无论从旧道德，从新道德，只要是损己利人的，他就挑选上，自己背起来。

他终于决定地改变了，有一回，曾经明白的告诉我，此后应该转换作品的内容和形式。我说：这怕难罢，譬如使惯了刀的，这回要他耍棍，怎么能行呢？他简洁的答道：只要学起来！

他说的并不是空话，真也在从新学起来了，其时他曾经带了一个朋友来访我，那就是冯铿女士。谈了一些天，我对于她终于很隔膜，我疑心她有点罗曼谛克，急于事功；我又疑心柔石的近来要做大部的小说，是发源于她的主张的。但我又疑心我自己，也许是柔石的先前的斩钉截铁的回答，正中了我那其实是偷懒的主张的伤疤，所以不自觉地迁怒到她身上去了。——我其实也并不比我所怕见的神经过敏而自尊的文学青年高明。

她的体质是弱的，也并不美丽。

三

直到“左翼作家联盟”成立之后，我才知道我所认识的白莽，就是在《拓荒者》上做诗的殷夫。有一次大会时，我便带了一本德译的，一个美国的新闻记者所做的中国游记去送他，这不过以为他可以由此练习德文，另外并无深意。然而他没有来。我只得又托了柔石。

但不久，他们竟一同被捕，我的那一本书，又被没收，落在“三道头”之类的手里了。

四

明日书店要出一种期刊，请柔石去做编辑，他答应了；书店还想印我的译著，托他来问版税的办法，我便将我和北新书局所订的合同，抄了一份交给他，他向衣袋里一塞，匆匆的走了。其时是一九三一年一月十六日的夜间，而不料这一去，竟就是我和他相见的末一回，竟就是我们的永诀。

第二天，他就在一个会场上被捕了，衣袋里还藏着我那印书的合同，听说官厅因此正在找寻我。印书的合同，是明明白白的，但我不愿意到那些不明不白的地方去辩解。记得《说岳全传》里讲过一个高僧，当追捕的差役刚到寺门之前，他就“坐化”了，还留下什么“何立从东来，我向西方走”的偈子。这是奴隶所幻想的脱离苦海的惟一的好方法，“剑侠”盼不到，最自在的惟此而已。我不是高僧，没有涅槃的自由，却还有生之留恋，我于是就逃走。

这一夜，我烧掉了朋友们的旧信札，就和女人抱着孩子走在一个客栈里。不几天，即听得外面纷纷传我被捕，或是被杀了，柔石的消息却很少。有的说，他曾经被巡捕带到明日书店里，问是否是编辑；有的说，他曾经被巡捕带往北新书局去，问是否是柔石，手上上了铐，可见案情是重的。但怎样的案情，却谁也不明白。

他在囚系中，我见过两次他写给同乡的信，第一回是这样的——

我与三十五位同犯（七个女的）于昨日到龙华。并于昨夜上了镣，开政治犯从未上镣之纪录。此案累及太